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1.04.009

《卡里来与笛木乃》：伊拉克文学经典的汉译传播与影响

李作霖, 龙 蓉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 伊拉克作家伊本·穆格法以印度《五卷书》为原本编纂的阿拉伯寓言故事集《卡里来与笛木乃》, 在阿拉伯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自五四时期以来, 其在中国受到译界广泛的关注, 迄今已有多种译本, 并对中国文学的发展, 特别是少数民族寓言文学和儿童文学的发展与成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伊拉克; 《卡里来与笛木乃》; 寓言文学; 儿童文学

中图分类号: H315.9; I04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1)04-0065-08

引用格式: 李作霖, 龙 蓉. 《卡里来与笛木乃》: 伊拉克文学经典的汉译传播与影响 [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6(4): 65-72.

Kalilah Wa Dimnah: Chinese Translation Communication and Influence of Iraqi Classic Literature

LI Zuolin, LONG Ro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Iraqi writer Ibnal-Mugafa's collection of Arabic fables *Kalilah Wa Dimnah*, originally compiled according to the *The Panchatantra*, occupies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Arabic literature. Since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t has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in translation circles in China. Up to now, there have been many versions, which have exerted a wide and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especially the development and maturity of fable literature of ethnic minorities and children's literature.

Keywords: Iraq; *Kalilah Wa Dimnah*; fable literature; children's literature

2015年,我国正式启动一带一路发展倡议,该倡议促进了不同区域、文化、信仰和语言文字

之间的交流互鉴。在这一背景下,学者们纷纷展开了对沿线各国文化的深入研究,其中,文学作

收稿日期: 2021-05-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学经典的汉译、传播与影响研究”(19BZW094)

作者简介: 李作霖(1968—),男,湖南沅江人,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文艺学;

龙 蓉(1999—),女,湖南娄底人,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写作学。

品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口。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大量外国文学包括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的文学作品就是在这时期被译介到中国,在中国传播,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选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伊拉克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一《卡里来与笛木乃》自五四运动以来在中国的汉译情况和传播过程作为研究对象,以深入探究其对中国文学的发展,特别是少数民族寓言文学和儿童文学的发展与成熟所产生的影响。

一 作为文学经典的《卡里来与笛木乃》

(一) 重要的史学地位

《卡里来与笛木乃》是一朵文学奇葩,在阿拉伯文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该书以印度梵文版《五卷书》中的寓言故事为重要的题材来源,由伊拉克作家伊本·穆格法编写成书。《卡里来与笛木乃》首开阿拉伯介绍其他民族文学之先河,掀起了阿拉伯的艺术散文之风。《五卷书》中的故事通过《卡里来与笛木乃》一书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在《十日谈》《拉芳丹寓言》《格林童话》以及《坎特伯雷故事集》等寓言或童话故事集中都可以找到《五卷书》的影子。有学者称,除了圣经以外,世界上不再有别的文学作品能够像《卡里来与笛木乃》一样被翻译成这么多语言,产生如此大的世界影响^[1]。五四运动以后,除了苏俄文学之外,大量的阿拉伯语文学也纷纷被译介到中国,《卡里来与笛木乃》也因其重要的文学史地位,引发了国人翻译的热潮。

(二) 作品内容与作者伊本·穆格法

季羨林先生曾经在为林兴华翻译的《卡里来与笛木乃》一书做序时提道:“古代印度有一部非常著名的寓言和童话集,叫做《五卷书》……译者是伊本阿里·穆格法。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加进了一些新东西,所以它不是一个纯粹的译本。”^[2]正是这个阿拉伯语译本,让《五卷书》以一种更加易于传播的方式,在全世界流行起来。可以说,它成为了之后《卡里来与笛木乃》在世界各地的文学旅行中最重要也是最权威的译本。各国的翻译家基本都是在此译本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译介的。

《卡里来与笛木乃》通过讲述精彩的动物故事,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教导人们伦理道德。《卡

里来与笛木乃》不是《五卷书》一个纯粹的译本,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凸显了作者自己的创作动机,有意强化了其劝谏君王、教化民众的教化作用。同时《卡里来与笛木乃》也是一部深刻且优美的散文著作,是阿拉伯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其文学价值甚至可与家喻户晓的《一千零一夜》相提并论。毫不夸张地说,《卡里来与笛木乃》的传播在世界文学中掀起了一股“寓言童话”的创作热潮。

《卡里来与笛木乃》这个书名源自于该书第一个故事中的“两只胡狼”,其试图通过由86篇有关动物鸟兽的故事,来反映人类生活世界中的种种现象。《卡里来与笛木乃》分绪论和正文两大部分,共20章。绪论部分包括《白哈努德伊本撒哈旺的序言》《白尔才外出使印度》等4章;正文部分包括《狮子和黄牛》《笛木乃的审讯》等16章。其中正文部分的《笛木乃的审讯》《教士和客人》以及《鸽子、狐狸和白鹤》3章属于伊本·穆格法自己的原创内容。

这些寓言故事体现了君臣之间的复杂关系,其属于典型的君王镜鉴文学。故事的讲述直指社会道德中的各种问题。“狮子”这种动物在《卡里来与笛木乃》中是君主的象征,其他食草动物则代表着广大平民。《卡里来与笛木乃》的语言十分流畅精炼,故事之间环环相扣且极富人生哲理;其倡导仁义、美德,贬斥罪恶和虚假,深受广大人民的喜爱。其中宣扬的平民与贵族平等、主张文化融合等思想体现出很强的民主意识、平等意识,在政治思想、社会价值观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卡里来与笛木乃》通过众多动物的故事隐喻了君王、臣民为人处世应遵奉的道德伦理。它主张修身齐家治国,明显是受到了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丝绸之路开辟以来,中阿之间的文化交流几乎没有中断过,中国的儒家文化和风俗习惯很早以前就为阿拉伯地区的人们所了解,所以其能在《卡里来和笛木乃》中有所反映并不奇怪^[3]。伊本·穆格法本人也在其著作中多次直接地提及中国和中国文化。

《卡里来与笛木乃》句式凝练、气质典雅、结构严谨,不刻意追求押韵和过分的修饰,读来却十分的清新自然。其语言看起来不加雕琢,实际

上作者的语言功夫极深,《卡里来与笛木乃》这种语言风格被人们视作“易而难及”的语言风格,其在阿拉伯散文史上的分量也仅次于《古兰经》。

伊本·穆格法(724—759)因为这本书成为了阿拉伯文坛的著名作家。伊本·穆格法生长于伊拉克文化名城巴士拉,精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他的思想融合了波斯、阿拉伯、希腊和印度文化^[4]。伊本·穆格法虽然深受阿拉伯文化的影响,但作为一个释奴,他目睹阿拉伯人的残暴无情,内心对阿拉伯人充满了怨恨,因此他试图通过文学这一媒介传播波斯文化和自己先进的改革思想。

(三) 中伊之间的交流历史

在美索不达米亚这个文明的摇篮里,曾经诞生过不少享誉世界的文学作品。这片土地上,孕育了世界文学史上最古老的史诗《吉尔加美什》和家喻户晓的寓言故事《一千零一夜》。地处亚洲西南部的伊拉克就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发源地。伊拉克位于阿拉伯世界的中心地带,中古时期,其现在的首都巴格达成为阿拉伯帝国的首都,成为阿拉伯帝国的政治中心^[5],伊拉克在推动阿拉伯文明向前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伊两国早在阿巴斯王朝时期(750—1258),也就是中国的唐朝时期,就有了较为密切的商业往来。唐朝的瓷器、丝绸等商品曾通过巴士拉港沿底格里斯河运抵巴格达,伊拉克的香料、马匹以及文化艺术也随着这条丝绸之路传到了大唐。中阿友谊源远流长,2015年两国正式签订“一带一路”倡议合作文件,进一步巩固并促进了双边的经济、文化友好交流^[6]。

二 《卡里来与笛木乃》五四时期以来的汉译与传播

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都是直接引进印度寓言故事,五四运动时期兴起的翻译热潮为《卡里来与笛木乃》引入中国提供了契机,让中国大众有机会接触到《卡里来与笛木乃》版本的寓言故事集。

(一) 作为起始点的《印度寓言》

五四运动以来,西方著作纷纷被译介到中国;与此同时,印度寓言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也受到了学界的高度重视。郑振铎在1924年的《小说月报》第十五卷第十一期和第十二期刊发了其翻译的48篇《印度寓言》。1925年8月,他又出版了

《印度寓言》一书,并于1927年10月再版^[7]。书版寓言增加到了55篇,以文言编就。虽然《印度寓言》大部分是根据印度古籍佛教典籍《百喻经》译过来的,但依然被看作是《卡里来与笛木乃》在中国传播的起始点。

紧随其后,刘半农、刘北茂两兄弟也译介了《印度寓言》,刘氏兄弟又将寓言篇幅增添到了106篇,分别于1927年和1931年出版。在1931年上海光明书店版《印度寓言》一书中的开篇“译者的话”里,刘北茂这样说:“我以为寓言就是寓意于言,不问其言及人类,动物,或者是一切无生命的东西,只求其能把人类的思想,动作,行为等都委之于他们传达出一种或多种的意义来。所以寓言又称为‘喻’。”^[8]这与郑振铎在1925年于《儿童文学》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到的“寓言的性质,半与故事相同,又半与比喻相同……最高尚的寓言常包含有伟大的目标,它在说着人间的真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9]^[468]。

(二) 林中兴的译本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国家非常重视文化的发展,世界经典文学成为了解外部世界的重要的窗口,因而这一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空前繁荣。1958年前后,学界出版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著作,之后的“大跃进”“十年文革”时期,翻译出版的文学作品就寥寥可数了。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文学翻译才逐步恢复元气。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近30年的时间里,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作绝大多数发表于1949年至1966年之间^[9]^[17]。

林兴华先生的《卡里来与笛木乃》译本发表于1959年,至1978年,一共重印3次。其再版于1988年,并于2019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再度印发,且被编入汉译阿拉伯经典文库^[10]。

季羨林先生在林兴华译本的序言中对其作了详尽介绍,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卡里来与笛木乃》中的寓言故事比较口语化,林兴华的译本充分利用了当时刚刚普及开来的汉语白话文精简、凝练的语言优势,相比于《印度寓言》前几个版本的文言来说,其对原作的还原程度更高^[10]^[15]。

(三) 《阿拉伯寓言故事〈卡里来和笛木乃〉》系列丛书

1986年1月至5月,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相继出版了由埃及拉吉阿纳伊特编著、巴赫曼奥斯

曼插画的系列图书《阿拉伯寓言故事〈卡里来和笛木乃〉》。该丛书共有14册,分别讲述了《鸽王》《逃亡的羚羊》《飞鼠》等14个《卡里来与笛木乃》中经典的动物故事,促进了《卡里来与笛木乃》在我国的传播。

该丛书采取图文并茂的方式,一个个小巧的故事独立成书,非常利于孩子阅读。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卡里来与笛木乃》在我国主要是作为儿童文学传播的。

(四) 康曼敏译本

2001年6月,由康曼敏译介的《卡里来与笛木乃》一书由海天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为上下两册,印数8000册。该版本由朱平编绘了许多生动的插图,其对孩子们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同时,编者还在书中给那些对孩子们来说比较生僻的汉字注了音,用词也比林兴华版本更为生活化,省去了原文中比较多的背景和细节刻画,只保留其中最简单的情节和语言。其生动形象的形式,也更加符合儿童的心理。译本略去了原文中政治背景的铺陈和道德上的说教,以动物之间发生的互动和对话为主,篇幅短小精悍,对儿童有非常好的教育作用^[11]。

(五) 李唯中的译本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版本,是2004年4月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李唯中译本《凯里来与迪木奈》,其包含40个脍炙人口的动物寓言。此时,正值改革开放后启动的新一轮中阿建交时期,中国对阿拉伯文学翻译的历史也由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这个时期,中国阿语文学翻译界资深翻译家李唯中对《卡里来与笛木乃》进行了重译,译本印数为3000册。该译本也是由阿拉伯文直接译出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与之前出现的译本相比较,无论是从篇幅,还是从故事数量看,其都堪称为最完整的汉译本^[10]。

该译本富有创新性地将《卡里来与笛木乃》中的众多寓言故事归纳总结成16个具有代表性的篇章,大多以动物命名,例如“狮子与黄牛篇”“鸽子篇”“猫头鹰与乌鸦篇”等等。其实,这些重要的动物寓言,在全世界许多的寓言和童话故事之中都能找到影子,其为寓言童话提供了非常优秀的模板和创作源泉,对世界文学产生了非常深

远的影响。

李唯中的这一译本,由于是直接阿拉伯语版本翻译过来的,充分保留了伊本·穆格法原作的风味。相较于印度寓言版本的文言古朴化、林兴华版本的俊逸凝练化和两个儿童文学译本的简约生活化,李唯中的译本的行文更加严谨,语言更加复杂,内容更加完整。例如在“序言”之后紧跟着的是《白尔泽维出使印度篇》《本书宗旨篇》以及《白尔泽维篇》,译者通过这几个篇章专门用来交代作者写作动机;在该书结尾部分,译者还细致地对《凯里来与迪木奈》的成书历史和作者生平进行了介绍。李唯中在这个部分的开篇提到:“本书自问世至今一再被翻译研究,足以表明其功贯千秋和诸民族对它的关注。”^[12]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卡里来与笛木乃》确实有其值得被一再翻译的价值,它在中国的译介传播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六) 《卡里来与笛木乃》在我国的研究情况

在搜寻五四以来学界对《卡里来与笛木乃》的学术研究情况过程中,笔者发现,学界对《卡里来与笛木乃》的研究十分有限。在知网数据库中搜索“卡里来与笛木乃”关键词,仅搜索到5篇相关文献。相比于搜索“印度寓言”关键词得到的38篇文献和搜索“五卷书”得到的91篇文献,《卡里来与笛木乃》在中国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

在这5篇文献中,《〈卡里来与笛木乃〉的成书始末》一文的作者余玉萍对该课题的研究最为深入,她还专门著有《伊本·穆格法及其改革思想》一书。在书中,她不仅对本·穆格法本人的性格和思想做了非常深刻的研究和剖析,序言中她还提到:“伊本·穆格法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表达了适应时代的文学改革思想,即以作品的思想统领文学艺术,追求阿拉伯散文思想性和文学性的统一。”^[14]由此可见,余玉萍本人是非常欣赏伊本·穆格法对《五卷书》的创造性译介的,也非常肯定其在阿拉伯文学史上的地位。

余玉萍认为,伊本·穆格法将民族融合、改革开放思想运用于《卡里来和笛木乃》的再创作,使之成为阿拉伯古典艺术散文历史上的典范之作,从而促成了阿拉伯教谕诗的形成,并对阿拉伯乃至世界寓言文学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4]。

三 《卡里来与笛木乃》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寓言文学的影响

《卡里来与笛木乃》对中国民族寓言故事和儿童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卡里来与笛木乃》的中文译本对我国少数民族寓言的创作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其次,《卡里来与笛木乃》不仅通过中译本在中国的传播引发了童话创作的热潮,对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产生直接影响,还通过在全世界的文学译介之旅,深刻地影响到世界各地的寓言和童话故事创作。之后,这些寓言和童话再由中国的翻译家译介到国内,对我国儿童文学的成熟产生了间接影响。

《卡里来与笛木乃》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寓言故事集,虽然其主角基本都是动物,但在伊本·穆格法的笔下,整本寓言更像是对人类社会的隐射,这种“托物言志”的叙事形式让《卡里来与笛木乃》成为世界文学史上脍炙人口的经典,其被称为“世界寓言的祖本”^[13]。

《卡里来与笛木乃》传入中国后发生了广泛的传播,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寓言文学的发展和研究进程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五卷书》在中国少数民族大多是以《卡里来与笛木乃》的译本形式传播的。中国各族人民将《卡里来与笛木乃》中的寓言故事,结合本民族的特色进行融合与发展,形成独具民族特点的寓言神话故事。在中国的新疆、西藏、内蒙古等边陲地区都可以找到以《五卷书》也就是《卡里来与笛木乃》中的寓言作为原型的民间寓言故事。

我国有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对比研究,研究成果丰富而显著。研究者们通过对比蒙古经典、回族民间故事、藏族动物故事和维吾尔民间故事与《五卷书》即《卡里来与笛木乃》之间的异同,得出结论:中国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确实深受其影响,并且对其做了许多具有当地特色的创造性改编。

(一) 内蒙古地区

巴图在《〈五卷书〉蒙译考》中总结道:内蒙古的诸多典籍如《育民甘露》注释、《萨迎格言》注释、《甘丹格言》注释、《喻法宝聚经》注释及《尸语故事》中都能找到《五卷书》中类似的故事^[14]。但是,他也认为这并不代表内蒙古地区这些民间

故事一定全部来自《五卷书》,因为以上出自佛教典籍的故事比《五卷书》成书更早,其可能是同一源头的不同传播途径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另一个版本的《五卷书》。巴图的研究非常客观,他没有因《五卷书》的重要地位而忽略文化典籍的多途径传播进程。

(二) 回族地区

钟亚军《回族民间故事与阿拉伯故事的比较研究》一文认为,回族民间文学与阿拉伯文学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者比较了回族民间文学与《卡里来与笛木乃》中的故事架构,发现其中有9例相似^[15]。作者认为,回族的这部分民间故事和《卡里来与笛木乃》中类似故事相比,道德标准更高,说教更多;其主张有恶必惩,而不是像阿拉伯文化中没有永远的朋友或者敌人这样模棱两可的道德观。也就是说,《卡里来与笛木乃》在回族地区的传播过程中,不仅深刻影响到了当地寓言故事的创作,还与回族文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融合。回族的民间故事不是一味地模仿和复制《卡里来与笛木乃》,而是对其进行了本土化的全新改造。

(三) 藏族地区

索南措在《论印度故事对藏族故事的影响》一文提出,藏族地区的动物故事数量很多、种类也很齐全,这无疑受到了《五卷书》的影响。他还发现,藏族地区与中原汉族地区的民间文学有一个显著的差异,那就是藏族民间故事中的主人公形象更加西化,其民间故事中大量用到了公主、国王、士兵之类的西方称谓,这些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五卷书》的影响^[16]。

桑吉东知《印度〈五卷书〉与藏族寓言故事》一文认为,印度《五卷书》不是由佛教徒传入西藏的,而是由那时候的商人和传教士传入西藏的^[17]。

(四) 维吾尔地区

穆罕默德吐尔逊《〈五卷书〉与维吾尔民间故事》一文通过对比研究,分析了《五卷书》对维吾尔族民间寓言故事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刘守华著有《民间故事比较研究》一书,该书探讨了日本、印度等国对中国民间故事发展的影响;其中有一篇标题为《〈卡里来和笛木乃〉与新疆各族民间故事》的文章提出,在新疆民间文学样本本来就偏少的情况下,源自于《五卷书》中

的寓言故事占据了十分大的比例,从已经翻译出来的汉语译本中就发现了二者十几例相似之处^[18]。

从对以上学者的研究分析中笔者发现,这些学者研究过程中参考的基本都是五四时期以后的中译本,例如蒙古民间故事研究者巴图和藏族民间故事研究者桑吉东知参考的就是季羨林的《五卷书》中译本,回族民间故事研究者钟亚军参考的是李唯中的《卡里来与笛木乃》中译本等等,且这些研究成果的发表时间都集中在两个译本问世之后的几年间。由此可见,五四后《卡里来与笛木乃》中译本的出现,对中国少数民族民间寓言故事的研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甚至可以说是启动作用。

《卡里来与笛木乃》中的寓言故事对中国少数民族寓言文学的影响虽然不止在五四以后,但其五四后的中译本无疑让更多人了解到了中国少数民族民间寓言故事与《卡里来与笛木乃》之间那千丝万缕的联系,至少让中文学者有了更多、更确切的研究材料。由此可见,翻译的传播可以极大地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可以加快各国文化的研究进程。

四 《卡里来与笛木乃》译介对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影响

(一)《儿童文学》译作的推动

郑振铎先生在翻译《印度寓言》一书时将其归于儿童文学的范畴,他积极组织当时的作家以《儿童世界》为主阵地,大量地翻译、介绍外国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以供中国儿童阅读和中国作家学习,其中就包括了数量可观的印度和阿拉伯寓言故事。例如,《儿童文学》第1卷第4期刊登了阿拉伯故事《骡子》;第1卷第9期刊登了印度故事《聪明的审判官》;第2卷第3期刊登了印度寓言《靴》;第6卷第13期刊登了印度故事《树狸和蟹》等等。

受到这些寓言文学的影响,他还自发地创作了一系列极具中国民族特色的寓言童话故事,为早期儿童文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的创作之路^[7]。

《儿童世界》的创刊,促进了中国第一批儿童文学作家的产生,同时为中国儿童文学事业发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印度寓言故事也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笔者认为,《卡里

来与笛木乃》以《印度寓言》为媒介,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二)“牧歌时代”创作的影响

五四运动引入了西方儿童文学理论,这一时期也在中国形成了“儿童本位论”的教育观。中国新文坛在《印度寓言》和其他一系列国外文学的影响下,进入了“牧歌时代”,即注重人间温情与爱对人性的关怀作用,倡导天真之爱与纯洁之爱,其对之后冰心、叶圣陶等作家的创作观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叶圣陶先生在《儿童文学》上发表的标志着中国原创童话诞生的《小白船》,其主旨就是倡导真善美和纯洁的心灵。

此创作倾向对郑振铎创作的影响最大,郑振铎在其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积极乐观向上的主角形象,让他们经历艰难险阻,在与恶势力的战斗中取得最后的胜利,郑振铎的这些作品体现了儿童文学对儿童的正面导向作用。

(三)不同文种译本的间接影响

五四运动后,国内思想大解放,更多的世界经典儿童文学譬如《伊索寓言》《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等纷纷被译介到中国。此时,《卡里来与笛木乃》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更多的是对创作题材和架构的一种比较间接的、潜移默化式的影响。

《五卷书》中的印度寓言曾借由《卡里来与笛木乃》的东风,吹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撒下了自由的种子,该文本先后被翻译为叙利亚文、希腊文、意大利文、拉丁文、德文、丹麦文、冰岛文、希伯来文、土耳其文、英文、法文等多种文字版本^[11],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土壤中长出了自己的一片片茂密森林。

《五卷书》被视为世界儿童文学诞生的标志,印度学者D·P·辛加尔在《印度与世界文明》一书中指出:“印度的《五卷书》对西方寓言故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它无疑是以《卡里来和笛木乃》为媒介的。”^[19]

以世界闻名的《伊索寓言》为例,赵建国在其《〈五卷书〉与〈伊索寓言〉比较研究》一文中详细对比了《五卷书》与《伊索寓言》异同,发现《五卷书》和《伊索寓言》中有十一个相似的寓言故事^[20]。他在《〈卡里来和笛木乃〉与〈伊索寓言〉

比较研究》一文中又详细对照比较了其中五组寓言, 并疏通了一条印度文学通过阿拉伯文学传播到欧洲的清晰且相互交流的路线。例如,《卡里来与笛木乃》中“驴无耳心”的寓言故事, 讲述的是狮子想要吃驴子, 派狐狸前去诱骗, 驴子在上了一次当的情况下, 禁不住诱惑, 又再次上了当、继而丧命的故事。在伊索寓言中, 可以找到类似的故事, 其名为“狮子与狐狸与鹿”, 只不过后者将驴替换成了鹿。

中国作家沈雁冰创作的儿童寓言故事《狮骡访猪》无疑也受到了《伊索寓言》和《卡里来与笛木乃》中这个故事原型的影响, 只不过他将驴或鹿换成了骡子, 将狐狸换作猪, 进行了更符合中国读者习惯的本土化改编^[21]。寓言原本是要教导人们不要不辨真伪, 以防遭受灭顶之灾。虽然沈雁冰的童话中讲述的故事内容和主旨已经大相径庭, 里面的狮子更加贪心, 骡子也因与狮子一起被猎人捉住而不免被判断为坏人一类, 其表达的是更具中国特色的道德教育主旨, 但同时, 沈雁冰的童话也告诫人们要警惕花言巧语, 要有明辨善恶的智慧。

我们通过这个故事在三个不同文本的演变, 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 故事中的驴、鹿和骡子, 分别是阿拉伯文化、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中弱者的代表, 可谓是换汤不换药。由此可见, 一个经典的故事原型和结构能在传播过程中与不同的文化进行交融和再创造, 焕发出新的生机。

这种间接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像是一种传承。这些世界优秀的儿童文学被引介到中国来后, 引发了一股儿童文学创作的热潮。其中,《儿童文学》杂志作为主要阵地, 起到了非常好的带头作用, 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则是《儿童文学》的主要约稿对象。

20 世纪的 20 年代, 以《儿童世界》杂志和《小说月报》为主阵地, 以郑振铎为首的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们积极译介、研究或创作儿童文学, 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儿童文学运动”^[22], 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

印度的《五卷书》经历了几个译本的流传, 最终由伊本·穆格法编写成最经典的阿拉伯译本。尔后, 在由郑振铎、林兴华、康曼敏、李唯中等

学者相继译介到中国来的过程中, 与中国文化产生了一定的碰撞, 与中国的各地不同民族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寓言文学, 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民间文学的研究进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卡里来与笛木乃》诞生后, 传播到全世界, 风靡全球, 对世界各国的寓言童话等儿童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发挥了巨大的引领作用。

五四以来, 随着《卡里来与笛木乃》中译本的相继问世, 越来越多的国内译者、研究者关注到了《卡里来与笛木乃》这本深刻影响全世界的故事文学的寓言故事集, 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接触到了这些富有想象力和教化意义的经典寓言。这一切, 离不开郑振铎、林兴华、李唯中、康曼敏等优秀译者的译介和新编。

我们也应该看到, 我国学界对《卡里来与笛木乃》中寓言故事的研究和推广并不十分成熟,《卡里来与笛木乃》的相关研究数量还是比较少。很多人知道《安徒生童话》, 知道《一千零一夜》, 知道《格林童话》《伊索寓言》, 但是对“世界寓言的祖本”——《卡里来与笛木乃》却缺乏足够的认识 and 了解。

笔者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作为一个源头性质的寓言原本, 其价值和声誉在其传播过程中, 随着受其影响的作品知名度越来越高,《卡里来与笛木乃》本身的影响力会被逐渐削减, 更新鲜的、更有创造性的、且符合各国本土文化特色的新文本层出不穷, 渐渐地遮掩了《卡里来与笛木乃》本身的文学光芒; 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 2004 年李唯中的这一个以阿拉伯语版本为翻译对象的全译本出现得比较晚, 以往的译本更多的是注重动物故事本身, 对《卡里来与笛木乃》原本的还原度不够, 使得其中丰富的文化价值没有得到充分显现。

值得欣慰的是,《卡里来与笛木乃》中的道德精神依旧流传于千千万万个寓言和童话故事中, 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 都能从一个个生动诙谐的故事中领略到一些做人处事的深刻道理, 这也算是对《卡里来与笛木乃》核心价值的弘扬传承了。《卡里来与笛木乃》是一部非常经典的寓言文学著作, 它值得研究者们对其进行更加深入更加系统的研究。另一方面, 我们也应该看到, 文学经典的优秀译介对文化的传播与影响至关重要。当

前,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世界上越来越到国家的呼应与支持,我们在探究外国文学经典对我们国家的影响的同时,也应该积极让自己国家的经典更快地“走出去”,在世界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与影响。

参考文献:

- [1] 薛克翘.季羨林学术著作选集: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6:146.
- [2] 伊本·穆加法.卡里来和笛木乃[M].林兴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1.
- [3] 孟昭毅.丝路驿花:阿拉伯波斯作家与中国文化[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98.
- [4] 余玉萍.伊本·穆加法及其改革思想[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7.
- [5] 仲跻昆.阿拉伯现代文学史[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506.
- [6] 张涛.一带一路引领中伊合作行稳致远[N].国际商报,2019-09-01(1).
- [7] 郑玉喆.《卡里来和笛木乃》与印度古籍的渊源[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8,2(4):52-53.
- [8] 刘北茂.印度寓言[M].上海:开明书店,1931:5.
- [9] 王泉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 [10] 郑玉喆.《卡里来和笛木乃》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D].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13.
- [11] 伊本·穆加法.卡里来与笛木乃[M].康曼敏,译.深圳:海天出版社,2001.
- [12] 伊本·穆加法.凯里来与迪木奈:全译本[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353.
- [13] 余玉萍.伊本·穆加法对《五卷书》的重新解读[J].国外文学,2003,23(2):106.
- [14] 巴图.《五卷书》蒙译考[J].蒙古学信息,1997(4):26-30.
- [15] 钟亚军.回族民间故事与阿拉伯故事的比较研究[J].宁夏社会科学,2011(3).
- [16] 索南措.论印度故事对藏族故事的影响:以几则动物故事为例[J].语文学刊(外语教育与教学),2009(12):102-104.
- [17] 桑吉东知.印度《五卷书》与藏族寓言故事[J].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4,23(2):64-70.
- [18] 刘守华.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123.
- [19] 辛加尔.印度与世界文明[M].庄万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232.
- [20] 赵建国.《五卷书》与《伊索寓言》比较研究[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7(6):149-151.
- [21] 赵建国.《卡里来和笛木乃》与《伊索寓言》比较研究[J].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6(5):83-86.
- [22] 李林静.《儿童世界》杂志探析(1922—1941年)[D].长春:吉林大学,2014.

责任编辑:黄声波